

我的 Olympic diary

奥林匹克日记

彭延媛 著

时隔四年，
那些

回忆，我们依然幸福！
伦敦，我来了，期待你一切顺利。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才工程资助项目

奥林匹克日记

彭延媛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奥林匹克日记 / 彭延媛著.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078-3463-5

I . ①奥… II . ①彭… III . ①体育—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59207号

奥林匹克日记

著 者	彭延媛
责任编辑	赵 芳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社 址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2年8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8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463-5 / G · 1395
定 价	29.8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我是愤青吗?

我自认不是“愤青”——自从“三观”形成以来，所谓“理性客观”就一直是本人自我标榜的口头禅。不过，在完成这本书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自己始终处于一种相当“愤怒”的状态。

写到北京奥运圣火在伦敦、巴黎传递的遭遇时，我是愤怒的；写到西方媒体对中国以及奥运会那些自以为是的报道和评价时，我是愤怒的；写到北京奥运会筹备过程里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困难和障碍时，我也是愤怒的；写到奥林匹克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时，我还是愤怒的；甚至，在期待这本书变成铅字的全程当中，我更是时不时就会陷入莫名其妙的焦躁和愤怒中……

牢骚太盛防肠断，愤怒过多肝也颤。我难免要反思一下：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你如此不淡定？而反思的结果很快就浮出水面：因为除了努力完整的记录下发生的这一切，我无能为力。

有人曾说过，只有一个专业的体育迷才能成为一个专业的体育记者，因为要长期从事这个行业，心中如果没有爱，是无法坚持到底的。然而现实告诉我，一个单纯的体育迷恐怕无法成为一个专业的体育记者，因为这个现实的世界有足够的本事，轻而易举地破坏你心中那份爱——一个中原因，各位尽可以在这本书中寻找。

其实，在还没有成为体育记者之前，我心里就非常明白，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是难以改变这个世界的，相反，它只能一次次拼尽全力去阻止这个世界改变自己。但是，当我亲身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时，那种无力的愤怒仍然时常充满脑海，因为它就在那里，就在眼前。

所以说，“就在那里，就在眼前”的北京奥运会对所有中国人而言，恐怕都是一次类似的“震撼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愤怒、沮丧、困惑、迷失……大概都是难以避免的。

不过，体育的神奇或许就在这里。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曾经说过，当英国广播公司2005年曝光国际奥委会委员斯拉夫科夫的腐败丑闻时（即所谓“全景门”），是他最感到沮

丧和失望的时候；然而，当他看到菲尔普斯、贝克勒、莎拉波娃这些年轻运动员在赛场上获得的非凡成就，“我的心情就突然变好了！”我想，在那一刻，IOC主席和我们一样，明白了自己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本书完成的时候，是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的2009年；而当它终于付梓的时候，2012年伦敦奥运会已经近在眼前。3年，从北京到伦敦，时间这把“杀猪刀”毫不留情地抹去或改写了我头脑中许多记忆的碎片，无论事实还是情绪，无论这个世界的面貌还是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无一例外都在改变。我也曾经想过，是否应该将全文改写，把许多现在看来显得非常“幼稚”或者过于“愤怒”的地方调整得更加与时俱进，然而转念一想，那又何必？或许，完成这本书的意义，就在于把北京奥运会带给如我这般中国人的“现场震撼”尽量真实地记录下来；而我这个小小的记录者，对那些“震撼”的第一反应尽管很可能是错误的、片面的、非理性的，但至少，我可以保证那是真诚的——如果当各位看完本书的最后一页，也能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我而言，也就足够了。

这本书并不是完整的记述北京奥运会的方方面面，也有很多的错误，很多个人的观点或许有些地方还与某些读者的印象不一致。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我真实的经历和想法，偏颇之处固然难以避免，只能请大家谅解。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父母，还有那些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帮助的人们，没有他们，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彭延媛

2012年7月10日

目录

自 序 我是愤青吗? 1

第一部分 变革时代与奥运同行

第一章 我们等待那一天.....	2
第二章 让世界倾听——和雅典奥运会的亲密接触.....	8
第三章 申奥的深奥.....	19
第四章 国际奥委会那档子事.....	37
第五章 国际奥委会委员的采访手记.....	62

第二部分 与奥运有关

第六章 在北京的空气中呼吸.....	78
第七章 “吃在北京”口难开.....	83
第八章 “所有的竞赛主任都是中国人”	87
第九章 东方明珠的奥运之梦.....	93
第十章 奥运会搭台唱的“戏”	99
第十一章 “八国联军”的北京攻略.....	109
第十二章 我所认识的西方媒体.....	119

第三部分 我陪“祥云”环球世界

第十三章 去告诉世界：“奥运会开始了”	130
第十四章 为什么“圆满”那么难.....	135
第十五章 奥运会让政治“走开”	139
第十六章 北京的五环旗是世界的五环旗.....	153
第十七章 国际媒体不是只有CNN	159
第十八章 我们的“极限”生活.....	166
第十九章 在那遥远的地方.....	182

第四部分 生活在历史中

第二十章 奥运会之前“低气压”	234
第二十一章 我们幸福吗.....	243

第一部分

变革时代与奥运同行





第一章

我们等待那一天

我和奥林匹克的日记是从“平淡无奇”这一页开始写起的。

2000年3月，我的大学时代还有一年才结束，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对台湾广播节目“空中之友”实习。某日，我的实习老师、制作人范焱挨个儿询问记者、编辑下周的选题。绞尽脑汁的我缩在一个角落，痛苦地等着轮到自己。

“小彭？”

“哦……我们做……” 几个选题都一一被否决，我的脖子后面越发冷飕飕的。

“还有别的题目吗？”

“有……”逼得急了，我脑海里不知从哪个角落突然凭空蹦出一个名词，被我像救命稻草一般一下子抓到手里，“我们做申奥吧！”

“喔……好！”

这是我第一次在工作中和奥运会拉上了关系。而那时，北京奥申委刚刚向国际奥委会提交了初步申办报告，在梦断蒙特卡洛7年之后，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北京，又要申办奥运会了，这一次，我们期待的是2008。

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次采访的情形。在北京申奥标志“中国结”首日封发行的发布会后，奥申委新闻宣传部副部长郭坦（他原来在北京青年报工作）接受了范焱和我的采访，非常详细地谈起了北京这次申奥的优势和劣势、对手和朋友。说了很多，大部分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郭坦提到，环境问题会是北京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北京所处的纬度和地域环境就决定了许多问题难以解决。而我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印象如此深刻，是因为就在那次采访前几天，北京刮起了春天“例行”的沙尘暴。每天骑自行车从北三环以里的皂君庙到长安街南边的真武庙附近上班的我，脑海中对“恐怖”的印象是12级阵风和中午12点依旧昏黄的天空……那次采访前，我查过资料：截至2000年，历届申办奥运会的国家一共有29个，其中光是美国就有10个城市参加过申办；在第12届奥运会申办的时候，总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14

个城市参与了竞争，而美国的底特律市申办过7次，结果却一次也没有成功，申办成功率等于零。尽管隐隐约约地知道上次申办时，北京只有两票之差，但走出采访地点新侨饭店之后，我心里仍然嘀咕着：北京，会成功吗？

2001年7月13日，同样的问题，再次反复被我嘀咕着，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刚刚正式成为体育记者12天的我，坐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体育部朝北那间寒冷的办公室里，左眼盯着电视、右眼盯着电脑，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萨马兰奇宣布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时刻的到来。

从2000年3月提交申办报告（就是我第一次采访申奥的时候）到这一天，中国人等待了16个月时间；说得远一点，从1993年到2001年，8年时间，中国人终于等到了这一天，等到了再次实现奥林匹克梦想的那个机会。

这16个月，也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实习，毕业，写论文，考研究生，找工作，甚至代表学校参加全国大专辩论会——尽管只是替补，以及祖母去世，在我人生中的分量都比北京申奥重得多。16个月或者8年的等待，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与申奥同行”有多么令人感慨。但我知道，这场等待，有很多人比我的印象来得深刻。

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几个月后，我给我们体育部当时的主任黄永国（如今已经奋战在别的工作岗位上）打电话：

“黄主任，我开始工作的时候都已经最后陈述了，所以对北京第二次申奥那段时间没什么感觉。您还记得吗？是不是真的一路领先？”

“当然记得，还真是一路领先呢！”

黄永国有资格说这句话，他在那16个月里一直代表国际台联络北京奥申委，大概过一段时间就要到奥申委开会，把国际媒体对北京申奥的各种报道汇总通报给奥申委以及北京市的相关人士。在2001年2月底，国际奥委会评估代表团到北京进行评估视察的时候，这种汇报尤其频繁，一个星期内开了好几次会。

经历过北京筹办奥运会最后一两年里国际舆论的那种风波，我忍不住要问：“申办的时候，舆情怎样呢？”

答案是很好。在那16个月里，整个国际舆论似乎都有一种“补偿心理”。1993年在蒙特卡洛申办2000年奥运会最后竞争中，北京仅仅以两票负于悉尼，与2000年奥运会擦肩而过，不仅仅是中国人，全世界有无数人为此遗憾；而在1999年爆发的盐湖城冬奥会申办贿选丑闻中，又连带扯出了悉尼当年也有相似的问题……北京，是被奥林匹克辜负的城市——那时的世界大概都做如是想。何况，北京在申办的过程中几乎每一步都表现良好，没有犯错。

“难道就没有一点微词？”

“嗯……要说有，也有，就是说我们有点爱做表面工夫。”

这个说法有实指也有虚指。实指，指的是2000年2月底，评估代表团来考察的时候，全

世界在北京寒意逼人的早春看见了五颜六色盛开的鲜花……至于虚指，我听过无数的说法，比较靠谱的一种，指的是外面不太相信“支持申办奥运会”民意调查的结果，尽管那些调查都是国外的著名机构，比如盖洛普公司所做的。后来，我见的“申奥故事”多了，多少也能理解那种不相信。要知道，巴黎申办2012年夏季奥运会的时候，临近最后陈述时民意调查支持申奥的巴黎人是85%，其他地区的法国人是79%，这就叫作“高支持率”，最后获胜的伦敦，当时的这两个数字分别只有68%和70%。北京申奥的时候呢？我翻资料时见过的数字从来没有低于90%的。就在那16个月里，盖洛普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有94.9%的北京人支持北京申奥，国际奥委会自己所做的民意调查数字更“吓人”——96%。虽说这些调查的结果都好于北京奥申委提供的数据，但中国社会表现出的惊人一致性，让见惯了“多元化”的西方社会极为不适应，当然会想到其他方面上……

按说，这点“批评”和人权问题的老调重弹很难对那时充满信心的中国人造成多大的心理冲击。但黄永国告诉我的一个故事，仍然让人感受到了那种等待过程中的焦虑。

就在国际奥委会评估代表团对北京进行考察的那几天，许多中国媒体都派出记者跟随采访代表团的活动——大家都很想第一时间就了解到代表团成员对北京申办工作的想法，自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代表团视察射击场地的时候，乌克兰籍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著名撑杆跳运动员布勃卡兴致很高，甚至跑到靶位前摆弄起枪械。看到这个难得的场面，我们国际台的记者趁势走上前去和布勃卡讨论起枪支与射击运动。两个人边说边“摆弄”，殊不知“吓”坏了旁边的奥申委工作人员，就怕一个不小心“走火”……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吧，结果是，当天晚上就有人给黄永国打电话，希望国际台撤换这位记者。时过境迁多年后，提起这件事，还让黄永国感慨不已。而我在想，这种等待中的焦虑，就是那时最接近奥运会的人们真实的心理吗？

林少文是国际广播电台的资深记者，如今已是俄罗斯及东欧广播中心主任。他曾经带队采访过2006年多哈亚运会，被我们戏称为“队长”。但是在7年前，当时还是国际台英语中心记者的林少文，却是我们台亲历北京申奥成功的五位记者之一——另外四位分别是体育部的赵明珠（已离开国际台）、时政部的全宇虹以及当时驻俄罗斯站的刘传锦和马骏。于是，我给“队长”打电话：

“您当时在莫斯科待了几天？”

“有六七天吧。”

“您觉得到了最后的阶段，那些申奥的最核心、最关键的人物，他们处于一种怎样的心理状态？”

“我觉得他们那时候是属于有把握，但不敢随便表示乐观。”

林少文告诉我，他对奥申委秘书长王伟（后来担任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兼秘书长）有着深刻的印象。早在2000年，他因申奥采访王伟的时候，王伟回答问题之间的那个“明显的分

“水岭”让他至今不忘，那就是其他什么问题都能详细解释，一到“成功有多少把握”就立刻含糊其辞，泛泛而谈，用类似“我们充满信心”这样冠冕堂皇但没什么实质内容的答案搪塞过去。弄得执著的林少文最后只好说：“你可以不回答，但我必须问。”而王伟也只能说：“如果我仅仅是个大学英语教授（他曾是首都师范大学的英语教授），那我就能回答。”

到了莫斯科最后的那几天，这个“分水岭”就被看守得更加严密，相关人士的口风更加地紧。林少文的感受是，其实那个时候，无论是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何振梁还是吕圣荣，或者是北京奥申委的官员，大家心底其实都非常自信，但真到了关键时刻，“再自信的人也难免怀疑自己”。这种心理反映到表面上，就是一种异常的谨慎，害怕节外生枝，害怕“意外”。林少文告诉我，他们甚至产生了一种很有趣的担心，那就是一方面担心中国记者在其他候选城市的新闻发布会问出过于具有攻击性的问题，引起别人对北京、对中国的反感；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记者提出有内涵、有挑战性的问题，给北京、给中国长脸……

亲历过那种“走钢丝”般的战战兢兢，林少文能理解北京奥申委那时的心情为何如此；而即使没有这种亲历的我，也能去试着体会，那都是因为1993年第一次申奥留下的记忆太惨痛了！1993年的时候，北京对形势的估计很乐观，前几轮投票也一直领先，谁知道最后一轮第一次落后，就是以2票输给了悉尼……经历过这种大起大落的人们，即使在第二次申奥过程中一路领先，也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但越接近那最后的答案，心跳得反而会更加厉害……

那么，在那16个月乃至整整8年的“等待”逐渐走到最后的定局时，当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某些地位独特的人又是怎么度过的呢？我说的是那几位在最后陈述中登场的人物，比如资深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北京申奥的“元老”和功臣何振梁。

2005年7月6日中午，我在新加坡莱佛士会议中心的会议大厅外采访了何振梁。那一天，是2012年夏季奥运会申办最后陈述的日子。

“何老，今天感觉怎么样？”

“今天我非常放松啊！”

“其实我是想问，4年前也有这么一天，不过是我们北京申奥的最后陈述。那天您的感觉和今天有什么不同？”

“4年前啊，我早上起来就和今天完全不一样了。我记得，我最后一次检查我自己带的所有文件、资料。然后，我就开始在脑子里回忆，回忆应该怎样做陈述，应该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很详细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你，今天，巴黎的人告诉（我），你的陈述，我们学了多少遍啊！”

那个“学生”没有成功，但在2001年7月13日这一天早上，等待那一刻到来的北京申奥最后的陈述者们都成功了。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一天——我的那一天。

那一天，我记得体育部是“空”的，所有的记者都被派了出去，整个部里就剩下我、主任黄永国、签稿人赵鹏程，可能还有一个实习生（谁也没法准确地回忆起到底还没有实习生的事情）。黄永国作为主任，他的任务除了守住体育部，还要指挥国际台在莫斯科前方的特派记者；第二天恰好碰上国际台主办的《世界新闻报》出报的日子，赵鹏程的任务就是负责做报纸；我呢，我被分配的任务正如前面所说：一只眼睛盯着电视，全程关注最后陈述的每一个细节，另一只眼睛盯着电脑，随时更新网络上的种种消息。

因为这样，我老老实实看完了五个城市的全部陈述。上午是大坂、多伦多和巴黎——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坂和多伦多的形式都异常活泼，又是小姑娘用小提琴拉了一曲《奥林匹克颂》，又是土著酋长全副盛装的出场为自己的城市站台拉票……而巴黎的宣传片也非常吸引人，用运动员的视角带领人们好好地逛了一趟“花都”，那种轻松的气氛很容易让人接受。

下午第一个陈述的北京，又让我记住了什么呢？老实说，和前三个城市相比，北京一开场让我有点失望，一个个陈述者轮流登台向委员们“信心喊话”。尽管李岚清副总理和当时奥申委体育主任楼大鹏的英语以及何振梁的英语、法语交替使用让我深感佩服，但形式过于简单，使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多少感到沉闷。不过有一点，我被震撼了，那就是北京的申奥宣传片。奥运电影大师格林斯潘与张艺谋的两部“申奥电影”，紧紧抓住了“激情”这个名词，让人看到了其他几个城市都没有充分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于奥运会的渴望。我想，至少这一点，北京是相当成功的——谁不知道中国人绝大部分都在渴望着一届奥运会的到来呢？

陈述的漫长让人觉得困倦，但最后的投票和宣布却来得那么迅速。那个时刻，空空的办公室慢慢开始变得满了起来，其他部门的同事都在朝着体育部“集结”。按照规则，每一轮投票得票最少的城市被淘汰，接着继续进行下一轮投票，直到有一个城市获得超过50%的票数为止。

我后来见过的申奥投票都经历了一轮轮没有硝烟却令人窒息的、残酷的“淘汰赛”。但我所见的这“第一次”，实际的操作流程异常短暂。北京时间晚上7点多，第二轮投票刚刚结束。我的两只眼睛现在全都集中在监票人手中装着本轮投票结果的信封上——因为如果这一轮就有城市获得超过半数的委员支持，那个信封就会被封上口，反之则不封口，那就意味着再淘汰一个城市，继续下轮投票……于是，我睁大了眼睛去关注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终于发现那个信封的确被封上了，并很快交到了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手里……

北京成功了！黄永国这个接近200斤的人一跃而起，和整个办公室里的高声欢呼，差点把我给吓到地上去。而据在场的人后来跟我说，那个时候，我完全不兴奋，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天安门广场几十万人和全国几亿人的狂喜，至少那一刻，是没有反映到我的身上——要知道，那天晚上的北京城彻夜不眠，几乎连交通都瘫痪了。我们派出去的记者，很多人都是

靠两条腿走回来的……

我的记忆基本也是如此。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着的，只是自己马上、立刻要做的工作，那就是编辑、翻译国外媒体对北京申奥成功的反应，给第二天《世界新闻报》的申奥成功版面使用。我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北京举办奥运会”这样的事件对整个中国将带来多大的震动和改变，还在14日凌晨5点下夜班时傻乎乎地问黄永国：

“今天的早班还上吗？”早班，一般是编辑前晚的国际体育新闻。

“用不着了！今天除了申奥，不会有别的新闻。”

如果我的确想到什么，那就是当我走出国际台大楼，在14日的晨曦中看着充满了狂欢残迹的这个城市，突然想到自己有好几张北京申奥标志“中国结”的首日封，上面还有设计者陈绍华的亲笔签名——这些就是2000年3月那次采访时的纪念品。我愣愣地一笑：它们终于等到了“升值”的这一天。

第二章

让世界倾听——和雅典奥运会的亲密接触

如果说北京申办成功的那一刻，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奥运会将为一个国家带来的冲击和震动的话，不用等到北京进入自己的“奥运时间”，我就从另外一个国家和另外个城市身上看到了那种改变的力量。这个城市就是奥林匹克的故乡——希腊雅典。

我是幸运的。当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之后，全国媒体都开始下大力气培养自己的体育记者。2002年，我第一次出国到韩国采访釜山亚运会，在自行车赛场碰到了一位新华社的记者。他告诉我，自己的任务就是每天“钉”在场地自行车比赛的场地里，专门负责写战报。我问：

“那你原来就是跑自行车项目的吗？”

“不是，我原来都不是体育部的——我是从国际部调过来的。”

我后来知道，新华社在那届亚运会上派出了八十多名记者，此后的每届综合性运动会，他们的报道规模都只大不小。

国际广播电台也是如此。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我们就派出了14人的报道团队，再加上两位驻韩国站的记者，在国内的广播电台中排在第一位，紧接着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我们又从亚洲广播联盟获得了15个有报道权的报道名额，最终有14名记者来到了奥林匹克的故乡。这14个人里就有我，一个刚刚从事体育报道工作3年的“新人”。

但雅典奥运会对我说来，已经不能算是“新”了。自从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受众对于雅典奥运会的兴趣就大大增长，经我的手编辑过的、有关雅典奥运会的新闻就知道有多少万字。而雅典，也确实很给“面子”，制造的新闻实在太多了！

2004年8月，我们的报道团队降落到雅典。从机场到驻地，我透过车窗，尽力想要看清楚这座“神话之城”的真面貌。结果是“百闻不如一见”，我失望地留下了两个印象：一个是随处可见的橄榄树，另一个就是远处的山脊上都是光秃秃的黄土地。关于后一点，我听说

是因为雅典的阳光照射太过强烈，除了橄榄树，许多植物都无法正常生长，才形成了这种独特的地貌。可是，当我们来到奥运设施区域内的时候，“黄土地”照样经常出现——我知道，这绝对不是“天生”，而是“人为”，因为雅典的奥运会场馆建设工期拖延之严重，绝对是“骇人听闻”的，以至于在已经进入奥运周期之后，许多景观工程设施都来不及完成，最终也用不着完成了。

有一段时间，当时还是体育部主任的黄永国有几次隐隐约约地提到，不要报道太多关于雅典建设工期拖延的新闻了。这让我很奇怪，以我的初步的新闻理念，场馆建设当然是奥运会最重要的核心事件之一，建设拖延更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肯定是有一条报一条，为什么要少报呢？

在多位领导的指点之下，我明白了。其实道理也很简单，雅典的建设拖延已经到了国际社会和国际奥委会难以容忍的地步——在雅典奥运会成功举办之后，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透露，在最紧张的时候，IOC居然开始考虑更换2004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而国际舆论和媒体更是早就把雅典骂得鼻青脸肿。这个时候，作为下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紧接雅典之后也要接受全世界“显微镜”观察的北京，多少得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吧。

我明白了。尽管只是一个小编辑，我还是试着去降低我能够掌握的报道幅度和调门——但恕我直言，实在做不到，因为类似的新闻越闹越大。直到奥运会倒计时100天的时候，雅典奥运会计划的39个关键的建设项目中，全部完成的只有18个。希腊相关方面对其他的项目只能删删减减以加快进度。而那个时候，远郊铁路和有轨电车的新线路也远远没有达到“准备好”的地步。更要命的是，由于工序复杂（估计不比“鸟巢”简单多少），主体育场天顶的安装一拖再拖，弄得IOC只好放下话说：如果5月20日之前搞不定，主体育场“秃顶”就“秃顶”吧……场馆设施工程的“简单化”，还招致了不少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不满，比如游泳馆，最终改为露天场地，让国际泳联痛骂雅典“没有遵守承诺”。这个游泳馆，我到雅典之后去过——没有天顶，让8月的雅典极其“灿烂”的阳光与人们直接、亲密地接触，多少让人担心会不会发生观众观赛时中暑的问题……与“水立方”魔幻一般的吸引力相比，的确是简陋了很多。

还有更吓人的事情。2004年7月12日，就在2004年奥运会开幕还有1个月的时候，雅典全市发生了大停电。大停电持续了一小时，范围最北达到距离雅典市中心248公里的拉里萨，最南达到280公里之外的卡拉马塔，此外还有几个岛屿也受到了停电的影响。期间，交通信号灯停止运作，造成了多起交通堵塞；电车停运，地铁乘客不得不走上地面步行；消防队更接到了数百起“电梯围困”的警报。一些奥运场馆被迫使用了发电机。最尴尬的是，停电发生时，希腊的交通部长里亚皮斯正在参加新的城市铁路线路试运行，这条从机场到雅典市中

心的城铁线路是专门为奥运会修建的。结果因为停电，他被堵在半道上进退两难。由于电流输送的不均衡状态，还有4座发电站被迫关闭。当时的希腊公共电力公司有关人员就暗示，这次停电是因为政府对高压电网管理不善而造成的。而我看过资料，雅典夏天平均气温是38度……

我真的尽力了，但这些新闻全都是“新闻”。而场馆和基础建设的工期拖延，还不是雅典最大的麻烦，最大的麻烦是“安保”。

去雅典之前，国际部的同事多次和我们开玩笑，提醒我们这些“奥运记者”要记住，自己随时可能变成“时政记者”甚至“战地记者”。前几次听到这样的话，我多半是玩笑以对，但听得多了，心里忍不住还是会毛毛的。当我们台的奥运报道先遣记者出发之后，还在北京的大部队收到的信息更让人“毛毛”的。

体育部副主任李大勇当时是先遣组的3位成员之一（另外两位是英语中心的杨滨源和意大利语部的王蕾蕾，后来前者去了奥组委，后者去了意大利驻华使馆，都是“牛人”）。出发之前，为了报道期间的方便，身材“雄壮”，胡子很容易“茂盛”的他特地理了个大光头。结果，先遣组抵达后在发回的电子邮件里告诉我们，这副形象一路上给李大勇找了很多麻烦，让他在机场不停地被安检人员“骚扰”——没办法，实在是如此模样太像所谓的“恐怖分子”……好笑吗？对于没有身临其境的那时的我们来说，恐怕是笑不出来的。我当时就在心里嘀咕：雅典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

我错了！实际上，是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在为奥运会举办期间的安全问题而神经过敏——要知道，那可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举办的第一届夏季奥运会！

在编辑那些关于雅典奥运会的新闻的时候，经常要核实的就是那一大堆的数字。我从小最恨的就是数学，大学的时候，全校公共课——高等数学，我花了两年时间才算“低空飞过”。可是，做雅典奥运会的新闻编辑，却让我牢牢记住了几个数字：国际奥委会为雅典奥运会不因战争、天灾、恐怖活动而取消，投保了1.7亿美元；而希腊政府的奥运会安保预算却从8亿美元很快上涨到了12亿美元，后来变成15亿，再后来又变成了18亿！创造了奥运会历史上的纪录。

这些预算最终变成了什么呢？变成把雅典从天上到水下，从空中到地面每一寸空气都监控起来的技术和人员。举个例子，雅典奥运会禁飞区覆盖了奥运主会场上空半径144公里的大面积空域，在这个范围内，任何潜在的威胁都受到严密监视，它们包括了被劫持飞机、导弹、滑翔机、遥控飞机、无人驾驶的飞行器等等；一旦以希腊总理为首的委员会确认了这些“威胁”，军队就获准将其击落。奥运期间，希腊军方的5个防空基地都被投入奥运安保的大系统中，在这些基地中，有3个部署了美制的“爱国者”导弹。据悉，其中一个“爱国

者”的基地就在奥运村附近。至于人员，仅仅是希腊方面就动员了近10万名军队和警察，进行了多次安保演习，演习中还发生了参与军官重伤的意外。

我说“仅仅”是希腊，是因为实际上，雅典奥运会安保把整个世界都搅了进来。奥运会期间，北约和希腊政府达成协议，为他们提供空中、海上的巡逻警戒以及防生化武器的专家队伍。美国据说派遣了400名特种部队军人前往参与奥运安保，还有200人的反恐专家等专业人士。美国奥运会代表团自带了24名武装保镖——希腊政府虽然不允许外国武装人员入境，但他们允许外国领导人自带武装保镖，而美国奥运代表团团长是前总统老布什。此外，匈牙利科学家贡献了一套专门检测放射性和化学武器攻击的实验设备，价值200万美元，“附带”操作设备的9名博士和其他专家——这套设备可以从很少量的空气样本中检测出上千种细菌、病毒和毒素，并在几个小时内就得出结果。对于极其担心生化武器攻击的奥运会来讲，这套设备倒很实用。捷克也派遣了100名反化学武器攻击的专家前往希腊；斯洛伐克还表示愿意帮忙。甚至对希腊来说简直是“天涯海角”的澳大利亚都声称，如果情况有变，他们会派出自己的武装保镖……

这些“新闻”都曾经过我的手编辑。干活的时候，我自己都不太相信每一个打出来的字——有这么恐怖吗？

答案是“有”。如果说发生在2001年美国纽约的9.11事件过于遥远，那么就在2004年3月11日，就在地中海的西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发生了3.11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191死1824伤，整个欧洲为之噤若寒蝉；位于地中海东头的希腊雅典更是加倍的寒气逼人，因为除了那些要给西方国家“好看”的外来恐怖分子，希腊内部也并不太平。2003年底，希腊政府刚刚瓦解了国内激进组织“11月17日”，还宣布过“国内恐怖活动终止”。谁知在2004年5月5日，就在雅典奥运会倒计时百日的那一天，凌晨4点前后的半个小时之内，雅典卡利西亚区的一所警察局前就接连发生3起爆炸，造成警局部分建筑和车库严重损坏，至少有1名警察在爆炸中受了轻伤。一开始，希腊政府还安慰大家，说“百日爆炸案”不一定和奥运会有关系，可能是个独立事件。然而，差不多10天之后——那天我当班，我亲手编辑的一条新闻打破了所有人的幻想：百日爆炸案是希腊国内的激进组织所为，理由是“不欢迎某些即将参与奥运会的国家”。

这一下，全世界就炸了，许多国家表示关切。澳大利亚和韩国甚至有相关组织和人士表示，“考虑退出雅典奥运会”，因为这两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美国发起的“反恐战争”。

我们这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中国人，老实说，也开始害怕了。按照惯例，每个新闻单位都会为参加奥运会报道的记者准备统一的服装，我们国际台也是如此，无论是T恤还是摄影背